

武汉工运史料

建国初期武汉工运史座谈会专辑

2
1985

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

编者的话

1985年1月28日至30日，武汉市总工会召开了建国初期武汉工运史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顾大椿、黄民伟、刘实、江浩然、赵铁夫、张汝霖、孙文英、吴正东、吕梁、邢一光、张学忠、徐子洲、姚志学、邓椿年、韩绍磐、周先根、谢国治、于芳林、伍千平、周岳、张文藻。

座谈会由武汉市总工会主席李梅芳主持並代表市总工会党组讲话。第一天，全总副主席顾大椿、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市委副书记谢培栋、市顾委常委赵铁夫都讲了话。他们一致指出，建国初期武汉工人运动发展很快，值得回忆的重大事件和总结的经验很多，召开这次座谈会很有意义。他们希望座谈会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达到总结历史、指导现实、促进改革的目的。

与会同志对这段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重大事件、经验教训和如何编好工运史，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提出了重要的情况和宝贵意见。特别是当年市总工会几位负责同志的发言，既深刻地总结了建国初期武汉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又对如何运用这些历史经验开创当前工会工作新局面提出了重要意见。

为了适应广大工会干部学习工运历史经验、搞好当前改革中工会工作的需要，我们将这些发言整理发表。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们只整理了部份同志的发言，只摘发言的主要内容。摘发的材料，是我们按照记录整理的，未经本人审阅。

目 录

建国初期武汉工运史座谈会

编 者 的 话

刘 实同志的发言.....	(1)
黄民伟同志的发言.....	(13)
江浩然同志的发言.....	(18)
赵铁夫同志的发言.....	(23)
孙文英同志的发言.....	(28)
徐子洲同志的发言.....	(32)
张学忠同志的发言.....	(36)
谢国治同志的发言.....	(38)

访 问 记

访问赵铁夫同志记录	(40)
-----------------	--------

刘实同志的发言

武汉工人运动，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有了党、武汉就有工人运动。武汉两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一次是抗战初期，整个中心是延安，武汉在周总理、董老领导下在全国也有影响。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很久很深。1945年我们到武汉来的力量不太大，时间只有短短三年，但工作发展很快，很快把党组织建立起来了，群众中也有相当的积极分子。武汉工作发展快的原因，除革命处在胜利的形势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在工人中有很深厚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组织上的联系，是整个政治上的影响，在群众中生了根。工人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工人要翻身要找共产党。有一些老工人，如一纱厂的工人袁道华，文化水平不高，但只要一讲共产党，什么牺牲都可以，什么都不怕。被服厂的工人李启新，党与他组织上的联系很晚，后来也很快参加到工作中来。武汉周围农村的革命武装力量一直未断，进武汉作工的农民，也从农村带来一些党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武汉工作，随时感到武装斗争在周围的力量。当时，我们在这个政治基础上工作，有这样好的优良革命斗争传统，所以工作进展比较快。

建国初期，武汉工人运动发展更快，正面经验较多。好好回顾，形成一个比较准确地反映当时情况的史或志，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写建国前工运史比较注意，写建国后的史花的力气不多，包括全总在内。前一段重点抢救建国前的资料

是对的，不然有的资料散失了，有的同志年事已高了，不抢救就无可挽回。现在，应该重视建国后工运史工作。这段时期工运工作历史经验，与当前工作关系更直接，不把这些历史经验总结出来，发展当前工会工作就缺少条件。而且，工会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往往不是解放前，虽然解放前也有一些，但更多的分歧是在解放之后，需要研究统一认识。工会十大时写了个材料，已经写了，但拿不出来，原因是经验教训在哪里，不容易写得深，有些问题一下子难以统一认识，所以最后没拿出来。今年“五一”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六十周年，正在写中国工人运动六十年的简史，前二十五年拿出来了，后三十五年反而不容易拿出来。重点要放在后三十五年，要多花一些力气。建国初期有两段：一段是恢复时期，一段是“一化三改造”，骨干企业是这时搞起来的。这是建国后搞得较好的两段时期，正面经验比较多。这段时期经验教训写得深，确实对当前工作能起指导作用。总之，武汉市总工会抓建国后工运史工作，召开建国初期武汉工运史座谈会，意义是很大的。

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建国后武汉工人运动大事年表》（初稿），只有记，没有述，更没有立论。应该在《大事年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一个比较系统一些的、能看出经验教训的史。方法是对的，先从史实入手，即搞《大事年表》，在此基础上再立论，“太史公曰”。现在不是一个人曰，是大家曰，象今天这样开座谈会大家讨论，应该超过太史公，比他一个人曰的好。

将来可形成两个东西：一个是大事年表，一个是史。先把史实摆好，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还可以提高，

更长时间回头看这一段，你会有新的认识，你明天还可以推翻我们今天写的东西。认识可以不同，但共同的依据是史实。所以，继续征集资料，补充修改《大事年表》，这个工作还要作下去。

《大事年表》要详略得当。当时有重大影响、对当前和今后有重大意义的，史料还可详一些，加重一些。当时影响不大、从长远看意义不大的，可删去一些。总之，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把史料作一些处理。如何详略，这涉及到如何认识这段时期的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当时我们从农村到城市、从武装斗争到经济建设大转折的指导文件。主要精神是：恢复发展生产是中心任务，从进城第一天起，就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当时还有那么多阶级，依靠谁呢？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一定要采取群众路线的一套工作方法，作好我们的职工群众工作。由于有这些明确的指导思想，还有一些基本政策，所以我们进城以后，感到非常明确。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这段时期的历史经验，证明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历史不能修改，要尊重历史，问题是怎样认识历史。我们要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去认识历史，这样去写大事年表，去写建国初期的工运史，才有条件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比较好的历史。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写出建国初期武汉工人运动史，就会对当前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对全国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起指导作用，有重大意义。为了总结过去，指导现在，推动改革，还可说推动四化建设，我建议在修改《建国初期武汉工人运动大事年表》和写《建国初期武汉工人运动史》时，在以下三

个方面加重一些。

第一，生产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之所以正确，就因为抓住了最根本的问题——发展生产力。什么时候抓住这个根本，什么时候工作就对了；什么时候没抓住这个根本，什么时候工作就出毛病。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任务繁重，接管、镇反、建党、建政、失业、物价……不管什么问题，都离不开把生产搞上去这个根本。只有把生产搞上去了，才有解决各个问题的条件。各项工作，凡是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就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抓；凡是阻碍恢复发展生产的，一定要排除它。各项工作不是孤立的，都是围绕恢复发展生产这个中心。镇反：反革命不镇压，变天思想不去掉，生产上不去。抗美援朝：利用调动起来的工人爱国积极性，工厂当战场，机器当武器，把生产搞上去。提高工人觉悟，主要是在发展生产中工人要有主人翁态度。开劳模会，树立劳动最光荣的思想。市总工会开执委会，每次中心都谈发展生产。旧制度要打倒，就是因为它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新制度要建立，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这个观点，后来被歪曲了。1958年有个高指标。1962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力量抓阶级斗争，生产成为次要的，冲击一下都无所谓。1984年小平同志说，当时我们处在不清醒的状态，指的就是在发展生产力上不清醒。1962年到1965年生产还是在发展，但思想相当乱。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把生产搞得一塌糊涂。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于我们头脑里还有“左”的东西，相当长时间接受不了。把这个问题搞深，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内

针、路线和政策，对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意义是很重大的。是有利于发展生产，还是不利于发展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判断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是正确的、可行的；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是错误的、有害的。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所以需要改造，就是它的所有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公私合营之后，生产确实有很大发展。但有些也搞急了一点，敲锣打鼓也有值得分析的地方，给后来留下一些问题。农村改造前两段要肯定，有些地方是不是一定要组织到那么个程度，搞得那么快？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是否一定要组织到那么个程度，是否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后来，集体实际都变成国营，个体经营者也成了资本家。要用这个指导思想记述这个过程。这一点挖得越深，对今天两个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就越自觉。这是第一个思想。

第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在全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工人阶级。要发展生产，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当时，在政治上，工人阶级的地位很响亮；经济上，帮助解决困难，科学文化教育上，也花了很大力气。依靠工人阶级不是群众是怎样，就是怎样，而是不断提高工人的觉悟，工人觉悟越高越依靠。从工会内部讲是工人队伍的建设，从党内讲是我们的基础，从政权讲是我们的支柱。这些关系，当时都是反复地讲。我们进城的人不多，原来的力量很小，我们作了一点工作，作的工作很少，但我们很快在城市内有了力量。当时全市工人中没多少党员，有的厂根本没有党员，但我们的力量很强大，真是一呼百应。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阶级关系有变化，但要坚定依靠基本群众，这个

思想要贯穿下来。现在武汉工人比那时壮大得多，从十八万发展到一百九十多万。数量上壮大了，质量上提高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份，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比解放初不知变化多大，那时识字的少，不识字的占绝大多数。现在工人中不识字的还有，但究竟少得多了。那时办扫盲班，现在办中专班、大专班。工人政治觉悟也提高了，虽然有“文革”留下的无政府主义等问题，但整个阶级的觉悟是高的。那时对工人进行的是启蒙教育，从劳动创造人等最基本的东西讲起，现在工人知道的知识就多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那时有的工人害怕“洋人”、害怕资本家，现在工人有敢于革命、勇于改革的精神。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当时也有斗争。是依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城市贫民？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解决好，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党和工人阶级心贴心。我们是长期的执政党，好象用行政命令自上而下的一套也可以行得通，依靠谁的观念慢慢淡薄了。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工厂中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确实需要把厂长负责制建立起来，但在建立严格的责任制的同时，又要解决充分依靠群众的问题。在决策的过程中依靠千百万人的意志，在执行的过程中千百万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两个关系要处理好。要把民主管理坚定不移地搞好。要总结这段时期如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经验，要把这个历史经验表达充分。那时，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我们就坚持，不管是谁讲的，这不是对哪一个人说话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维护一点利益的问题，而是关系如何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的这个根本问题。当时依靠工人阶级，还有一个对资本家的斗争、消灭

剥削阶级的问题。劳资协商会议，实际上是我们对资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有利于依靠工人阶级去改造资本家，从内部推动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这个问题现在不存在，现在与当时不能简单地对比，但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思想要贯穿下来。

第三，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作好群众工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在新的形势下，还是要把群众路线发挥充分。建国初期工运工作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我们党虽然长期离开城市，城市力量比较薄弱，返回城市后，很快与广大工人建立血肉般的联系。1983年我与黄民伟同志在深圳，市总工会的同志带我们去参观一个港商独资经营的印染厂，我们的工会不懂得在这样没有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企业如何与工人建立联系，全总与工人谈不上话，只有找资方代理人谈。我与深圳市总工会同志座谈，就谈解放初期，武汉很多工厂没我们的人，军代表还没接管，我们工会干部如何到工人中间去，与工人建立联系。当时，我们到工人中间去，让工人熟悉我们，我们也熟悉工人。我们宣传党的政策，影响工人，发现积极分子，经过他们去发动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完全生活在群众中间。现在工人上班不能离开岗位，工会干部用上班时间作工人工作不行了，只能用业余时间，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工作，不然工作作不进去。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基层调查，干部说工会作了很多工作，群众说工会没作什么，很矛盾。基层工会确实作了不少工作，但工人感到他能参加的、对他有帮助的，又没有几样。这里面，有一个如何从工人本身的需要出发，从他自己愿意接受、可以接受，他确实感到这样作对他有好处，从这儿入手作工作的问题。建国初期扫盲，确实符

合工人的需要，工人叫扫盲是文化上翻身。很多五十年代出来的工人干部，包括全总的倪志福同志，都说自己是那时扫的盲。郝建秀同志也是那时学的文化，然后上了纺织学院。这样的同志很多。现在，工人对学习文化科学技术更加迫切，那是四化的要求，是人材的要求，是他个人的最大要求。工会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真正抓住几样。当时工人最需要的还有劳保，工人说，有劳保就放心了，生老病死伤残等旧社会工人最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工人文化宫也受工人欢迎，既使工人在业余时间得到休息和娱乐，又用吸引的办法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当时按工人需要作的工作，还可以讲很多。有了这，就产生了积极分子，工会在此基础上就建立起来了，活跃起来了。当时，工会对政权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人是城市的主要居民，工人及家属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建立政权。从工人中，选举人民代表，给各级政权送干部，公安组织的建立也是工会输送积极分子。家属委员会协助政府作了很多工作，许多服务性活动也是家属委员会搞的。后来有的地方家属委员会没有了，双职工多，谁是家属搞不清楚了。现在支持政府建设好城市有新的内容，有些工作，如综合治理，挽救失足青年，比过去抓得更好。当前，治理脏乱差是建设城市的突出内容，工会起什么作用？这不是简单的批评问题，发牢骚的问题，因为脏乱差是我们工人自己在起作用，工会有责任作工作，工会完全作得上去。北京工会决定集中力量治差。在改革中，有的单位确实有点乱涨价。一个单位涨价，好象对这个小团体的工人有点好处，其实是互相损害。你这儿涨一点我吃亏，我这儿涨一点你吃亏，结果大

家都吃亏。把这个道理讲透了，工人是会支持的。工会可以在这方面起点作用。还有建党，地下党是在斗争中建党，建党推动斗争。解放初期，是党组织把干部放在工会里，开展群众活动，在活动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党员在群众中活动，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与群众有密切联系。那时党员不多。党组织不庞大，但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动员群众比较容易，不能简单地归于群众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确实有一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作群众工作的方法。当时有人有“大工会”的错觉，不懂得党必须通过工会组织作群众工作，才能在工人中扎下根，不懂得大部份干部必须经过群众工作的锻炼，还有人感到当时把工会干部抽得太快了，抽得太多了，削弱工会。是否抽得快了多了，还可研究。近几年有点相反的情况，靠党派干部加强工会。有几个方面，露出了好苗头。工会搞振兴中华读书活动，适应工人需要，发现了工人中的人材，上海市委组织部就从读书活动积极分子中挑选干部，有些人确实成了干部。武昌的谢家瑾，读书原来就有成就，不搞读书活动，她就不会那么出名。王素华原来默默无闻，搞读书活动后，才显出她的才华，送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去了。从读书活动可以看出，工会不是不能向党输送人材。技术协作活动如搞得好，外引内联，比过去技术攻关意义大得多，也可培养骨干，出大批人材。现在没有谁限制我们在群众中工作，而且要求我们把群众工作作好。历史上的好经验，确实可以指导今天。青年团的工作搞得比我们活跃，作工会工作的同志有向团组织学习的必要。上面的活动可以适当搞一点，关键是把基层活动搞起来。活动要适合群众的需要，要有新的特点。解放初期搞忆苦思甜，就可把工人发动起

来，现在搞忆苦思甜，就不行了。现在发动群众，也摸到点新门路，为支持他们自学，支持他们搞科研，建立各个兴趣小组，有电脑兴趣小组、激光通讯小组，还有的研究企业管理，写企业管理的著作。当前发动群众，要从他们现在的水平、现在的需要、现在的条件出发，把他们发动起来。解放初期，这个观点非常强：工会组织不仅建设自身，而且建设政权，建设党。政权是建立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的。党是建立在与群众有紧密联系、群众充分支持的基础上的。从这个角度考虑群众路线，工会的纽带作用才充分。纽带作用，决不是后来说的“上传下达”，他对了你传的也对，他错了你传的也错。这样的“上传下达”，不能真正从群众的要求出发，群众不需要的、群众所反感的，我们也不敢顶，因为我们与群众没有多少联系，我们对群众的要求了解得也不那么清楚。党的政策，什么是群众欢迎的，什么是群众不赞成的、反对的，我们有责任向党反映。这不是工会影响党的决策，而是群众的意见要求是党决策的基础。工会的纽带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而且把群众的意见要求正确地集中起来，反映给党。匈牙利的卡达尔很高明，他要求工会每月写一篇群众对党的政策的反映的报告，什么事群众在笑，他可以干，什么事群众在骂人，这个事要慎重。我党中央和各级党委也希望工会反映群众的意见。上次调整工资，方案国务院已通过了，正式文件已下达了，全总反映群众意见后，中央很重视，决定作一些变通。我们反映群众意见，党的正确政策能执行得更好，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执行。如果有某些方面情况掌握不全，我们有责任帮助党更真实，更全面地掌握这些情况，使党的决策更好地符合群众的要求。

这不是我们争权，是摆在我们身上的责任，不然，要我们群众组织干什么？工会干部不实事求是反映群众的要求，这个工会干部可以不要。小平同志几次讲，实事求是是很难的。工会贯彻群众路线，反映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工会组织讲，由于后来多次挨整，有不得不如此的一面；从个人讲，整得个人主义也有一点抬头，不那么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文革时，工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党搞成那个样子，有相当长一段党的威信相当低，有的人甚至产生信仰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对头了，党的威信就上来了，现在群众不是谈信仰这个根本问题，而是谈工资、物价等具体问题。现在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比前几年大变样了，可以说有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在改革过程中，勇于实践，同时又结合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充分走群众路线，搞得很顺利。农村改革，中央的办法就是这样，让农民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种地，劳动果实确实自己能得到，这样把农民发动起来。至于采取什么形式，头年总结，来个一号文件，次年总结，又来一个一号文件，今年是第四个一号文件，都是总结的群众经验。农村改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今后城市改革，也要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一步一步走下去。

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当时，有学习好的一面，人家的经验，好的东西，都应该学。不适合我们国情的东西，就不能搬，我们也有搬的一面。我也是搬运者之一，一天到晚搬，半夜还在整理笔记，是诚心诚意干的。但思想方法不对头，没有很好分析：哪些是适合我们实际的，应该多搞；哪些是不适合我们实际的，应该少搞或不

搞。即使是适合我们实际的，也要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搞。介绍人家的经验，要加以适当的说明。这一步工作，我们作得不够。特别是后来把这些东西固定化、僵化，造成多少年固定的模式，影响了、包括影响了我们工会本身的工作。现在，我们又在学习国外的经验，不仅学习日本的、西欧的、还学苏联的、东欧的，博采众长。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在述、论当时的历史时，要指出哪些学习起了好的作用，哪些学习不适合我们的实际。总结当时的经验教训，对当前工作，确实很有益处。

总之，我们编写工人运动史，当时有很大影响，目前又有很重要指导意义的，要详写、写深；当时有一定影响，现在没太大意义的，可简一些；当时就没有多大影响，现在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干脆去掉。我们不搞每天报纸摘要。《建国初期武汉工人运动大事年表》（初稿），有些可简，相当部份要补充。

黄民伟同志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到开封听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邓子恢、李雪峰同志告诉我：听了传达后到武汉去。五月份我从江汉地区来到武汉。那时到武汉有几个方面的力量：有解放军挺进的部队，有地下党组织刘实、江浩然等同志，还有中央城工部的同志，几方面的力量汇合一起来开展武汉的工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市管理和建设的中心就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等等，“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那时敌人的破坏也是想从生产上下手，党领导的护厂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着。武汉解放后，为了恢复生产，首先是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使它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手工业经济决定一个时期内不改变其分散、个体的性质，中南局和武汉市委都派出了工作组来进行这些工作。市工委一进城就建立了工作系统，由蔡书彬、廖似光、江浩然和我负责，中南局工委系统是李雪峰同志为书记，还有赵敏、何英才、王若平和我。工委是党委抓工运的机构，《大事年表》中要写一笔。工委作为工会筹备组的核心，还成立一个委员会，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分成许多组进行接管工作。我是背着枪到粤汉铁路去的，因为公

开的敌人虽然跑了，但潜伏下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活动。接管后，我们先发动群众搞清点，接着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也派去了工作组，主要是在四大纱厂（一纱、震寰、裕华、申新）、二十几个烟厂、九个面粉厂和造船厂，向资方宣传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促使私营企业生产迅速恢复。当时，资本家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有的跑了，有的观望，有的抽走资金，辞退工人。我们宣传了党的政策，开展了适当的斗争后，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以上情况说明，工会一开始就是紧紧围绕生产这个中心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的。

恢复生产也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交通阻塞，我们发动铁路工人抢修京汉路、粤汉路。缺乏动力，材料也是个问题，武汉二十几家烟厂有十多家因此停产。所以，政府又想办法去搞原料，想办法来发展生产。当时前方还在打仗，还有支援前线的任务，先是要支援全国解放，后来是抗美援朝。当时还有特务造谣，有人怕变天，我们要同隐藏的特务坏蛋作斗争，加强政治形势宣传工作。物价也是个问题。建国初实行的是实物工资，以粮和油的价格来搞折实工资，想了一些办法控制物价。还有个困难就是失业工人很多。我们采取了三条办法：一是以工代赈；二是组织生产自救；三是实在没有办法就遣散回乡。经过这些工作，武汉的工厂逐步恢复了生产。

生产恢复以后，就是建立工会组织。市委发了文件，中央开了工会工作会议，毛主席作了指示，要在一年内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当时的口号是：“自上而下搭架子，自下而上建工会”，“依靠工人办工会，大家办工会”。很快，搭起了十八个产业工会的架子。当时，伪工会还在活动，码头上一些流氓